

· 海韵楼小集 ·

周作人 精神肖像

黄开发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海韵楼小集·

周作人 精神肖像

黄开发 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黄开发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作人精神肖像 / 黄开发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4

(海鹊楼小集)

ISBN 978-7-205-08228-4

I. ①周… II. ①黄… III. ①周作人 (1885 ~ 1967)
— 人生哲学 — 研究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5011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20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装帧设计: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徐 钊

书 号: ISBN 978-7-205-08228-4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一、周作人的“人学”思想	
1. 人本主义	8
2. 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	15
3. 人生哲学	23
4. 儒家思想的重释	30
二、周作人的双重悲观与其附逆	
1. 对国民性的悲观	38
2. 人格面具	48
3. 辩解与不辩解	54
三、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	
1. 访方圻	56
2. 访范旭	58
3. 一组材料	60
四、周氏兄弟早期“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观	
1. 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	67
2. 不用之用	73
3. 别立新宗	78

五、周作人的文学观与功利主义	
1. 传统功利主义批判	88
2. 人生派与艺术派	91
3. 言志与载道	95
六、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热	
1. 一个晚明小品选本	102
2. 晚明小品热	107
3. 晚明小品与言志派	116
七、周作人小品文的文体	
1. 语体及其流变	119
2. 在平淡与不能平淡之间	124
3. 趣味·语言·气象	132
4. 抄书与抄书体	142
八、周作人书信	
1. “书”与“信”	150
2. 书牘文	152
3. 尺牘	156
附录 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	162
参考书目	172

引言

周作人（1885—1967）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有着深刻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翻译、新诗创作、散文创作诸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一流贡献。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以后又构建“言志”文学理论，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对主流绵延千年的载道主义传统进行了空前的阻击，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言志文学思潮，对认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得失，富于启示性。作为社会文化批评家，他秉承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被视为与鲁迅、胡适不相上下的思想家。^①作为文学批评家，他走的是印象式批评的路子，《自己的园地》一书确立了新文学批评的基石。作为新诗人，他的成就相对较小，然而《小河》等气象新颖的诗歌却是初期新诗运动中的杰作。作为翻译家，他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堪称典范的译作参与了新文学建设的进程，特别是其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鲜有人能与之比肩。当然，他最著名的身份还是散文家，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就被称为小品文之王，与鲁迅并列为现代汉语散文的两座最高峰。只是由于

① 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1934年12月《青年界》第6卷第5期）中说：“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十年以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他与乃兄鲁迅在过去时代同称为‘思想界的权威’。”夏志清指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这一段时期在当时社会发生最大影响，最能表现独特思想的三位文化界巨人，要算是胡适、鲁迅、周作人。”（夏志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1月，228页）

在抗战时期未能保持自己的节操，附逆投敌，他的名声才黯淡下去，以致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到了被遗忘的程度。

周作人一生走过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无疑，他生平最重要的辉煌、失败、屈辱都是在民国时期经历的。特别是民国历史上有三次重大的危机，对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三次危机是：辛亥革命后的封建复辟、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日本全面侵华。

民国建立以后，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渐渐成形，特别是大学制度为他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新闻出版制度则提供了自由言说的文化空间。虽然辛亥革命带来了新的政体，建立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军阀混战，封建复辟，民不聊生，教育凋敝，文化保守主义沉渣泛起……面对乱世中的共和国，知识者普遍的态度是极度的失望乃至绝望。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中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失望之余，自然要追寻缘由。鲁迅在该文中还说：“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与鲁迅一样，信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和支持革命，并参加了一些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家乡绍兴著文为新生的共和国欢欣鼓舞，还很快在新政权的教育部门任职。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7年4月，周作人来到北京，不久即遭遇张勋复辟的闹剧，产生了强烈的思想上的震动。他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一三》中写道：“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还在《知堂回想录·一一二》中说：“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在新文化倡导者们那里，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于是，他们想通过文学革命来实现思想革命，从而为政治革新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民国政府和政权意识形态毕生都采取了不认同或反叛的姿态。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面对纷至沓来的社会思潮，周作人提倡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主义，与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试图在民国体制以外另起炉灶。然而，正是种种的民国乱象为周作人与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提供了巨大的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数千年未曾有过的新的王纲解纽的时代。“现代”的春天乍暖还寒，传统的坚冰开始分崩离析，然而一座座冰山漂浮在海面上，危机四伏，周作人与几个主要的新文化的缔造者一起，设计出了新的航向，使新文化义无反顾

顾地驶入了一条宽广的现代航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主张,表现出系统的“人学”思想,为新文化确立了思想基调。20世纪20年代,他创造性地运用杂文和小品文的形式,与鲁迅、胡适等一起开展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

1927年,国民党为了争权和统一而发动的“清党”运动,是周作人前、后期思想和创作的一道分水岭。1927年、1928年对周作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流行说,周作人被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吓怕了,再也不敢像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中那样仗义执言了。其实,他在北京知道南方发生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后,发表了一系列杂文,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和麻木的国民所表现出的变态根性。国民党政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作人的不少青年朋友和学生也在其中罹难,他再次感到精神上的恐惧和思想上的震动。他在《语丝》140期上发表杂文《偶感之三》,文末写道:“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这是一个沉痛、忧愤深广的发现,他看到南方国民党政府与北方军阀相同的本质,更进而看到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不知道尊重生命的“嗜杀狂”。1927年的事件对周作人和鲁迅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国民党“清党”事件同样给了鲁迅强烈的震撼,他在《答有恒先生》《三闲集·序言》等文章中说其进化论的世界观因此崩毁。不过,他选择了与共产党联合,与现实的政权对抗,对一系列社会和文化事件发声。而周作人对现实的政治运动不感兴趣,坚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从中看出国人根深蒂固甚至说病入膏肓的国民“恶根性”。他消退了对启蒙主义的信心和热情,走上了一条消极个人主义式的“闭户读书”之路。他特别强调读古书,目的是要通过参照历史来解读现实,找出国民性的病根。明明知道虚无,偏又要去追迹、去察明,他把这种态度称为“伟大的捕风”。^①周作人在民国社会里形成了独特的民国体验,这决定了他对民族国家、中国文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基本判断,与其一生的功过是非有着内在的关联。现实的黑暗和腐败使他对中国传统中遗传性的“小鬼”^②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尖利的敏感,他始终警惕民国背后传统的长长的、浓重的阴影。传统文化在他那里受到全面的怀疑和批判。研究者往往因为周作人现实态度的消极性,忽视周作人这种探索重要的思想意义。尽管现实态度消极悲观,周氏仍然以一

①②《看云集·伟大的捕风》。

个现代知识分子平正、通达的态度,以“人学”思想为标准,去照亮、甄别传统,更进而以现代思想重释传统,其中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是“五四”新文化的一种宝贵品格,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新文化也富有启示。一种成熟、先进的文化离不开对自身的反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民国遭遇空前的危机,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一片抗战声中,周作人选择了逃避——“苦住”北平。他滞留北平当然有诸多现实的考量,但不可否认也有思想上的原因,这就是他对中国抗战前途的悲观。郑振铎在《惜周作人》^①一文中,记下了在七七事变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谈话:“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军力量的巨大。”这是他在现实层面上的悲观,然而在其对民族国家的悲观中,更主要的是他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悲观。他相信,一个“恶根性”已不可救治的民族是无法赢得一场现代战争的,缺乏抗战的物质装备倒是次要的因素。早在1933年1月14日致曹聚仁的信中,他就说:“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十日来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静了一点下来;如不佞等觉得无可逃,则仍未逃耳。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骄之气太甚,窃意丧败无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点何在,可望复兴。……五四时自己谴责最急进者,□□□□□□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他们虽似极左,而实在乃极右的一种国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为遗传学说(古人所谓‘业’)所恐胁,睹此更为栗然。中国如亡,其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一则断然为此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可无疑也。此刻现在,何处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来或不来,此或亦虚无主义之一支配!”^②对抗战前途的悲观也是他后来附逆投敌的思想原因之一。敌伪时期,一方面,他做了不少损害民族国家的事情;另一方面,其思想和创作大体延续了30年代的路子,并有新的拓展。

以上所述是民国时期对周作人影响最大的几次历史事件。民国是周作人一生中最重要生存空间,他与民国的关系如同植物与土地、空气,是须臾不离的。本书正是力图在民国历史、文化、文学的背景下,勾画出周作人的精神肖像。描绘一幅画,需要一个观察的角度。本书以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为基本视角,对

^① 1946年1月12日《周报》第19期。

^② 周作人:《致曹聚仁》,《知堂集外文》(下册),海口: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397—398页。

其人生道路、思想和文体进行整体的阐释。长期以来,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周作人的形象是分裂的,一个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与“汉奸”之间是无法调和的。有人曾把周作人附逆与李叔同出家、王国维自沉视为民国文化史上的三大谜团。鲁迅曾对人说过,散文诗集《野草》包括了他的全部哲学。^①许寿裳也有言:“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②我认为,在新诗集《过去的生命》中有着周作人的人生哲学。该集收录了作者从1919年到1923年的诗作,完整地记录这一阶段周作人的心路历程。他和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苦苦地寻觅人生的出路。在1921年4月所作《歧路》一诗中,他吐露了苦闷彷徨的心迹,面对人生的歧路不知该如何选择。到1923年7月的《寻路的人》,他找到了答案:“……[在人生旅途上]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那有什么关系?”他最终选择的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与现实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用“生活之艺术”(这是他作于1924年11月的一篇小品文的名字)来抵御人生的虚无。这个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体验及其选择对理解周作人以后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以为他矛盾复杂的一生提供统一的阐释。换一句话说,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为周作人画出一幅清晰、完整的肖像。民国的阴影笼罩着他,构成了画面的基调;画中人物的表情是萧散平淡的,然而难掩内心深处的苦涩。

本书1999年曾以“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现在看来青涩之处甚多。这次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撤去原书关于周作人研究的论争和研究述评的部分,附录了《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一文;撤去原书《文艺思想的考察》《民俗学方面的工作》,换上了三章论述周氏文艺思想的文字;其他各个部分只做了局部的增删修改,尽量保留原有的观点和脉络。总的来说,这是旧房子翻新,而非在原址上的重建。有些旧有的问题依然存在。

《人在旅途》得到过不少肯定和鼓励。钱理群先生写了热情的序文。吴成年先生发表书评《悲观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周作人——读黄开发的〈人在旅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余爱春先生发表论文《中西文化语境中的周作人文艺思想——黄开发〈人在旅途〉与卜立德〈一个中国人的文

① 章衣萍:《古庙杂谈》(五),1925年3月31日《京报副刊》第105号。

②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8月2版,42页。

学观》之比较》(《理论月刊》2010年第8期),孙郁、陈剑晖、安文军、李宪瑜诸位在相关著述中,都曾给予过积极的评价。他们的鼓励是本书得以修订的动力之一。

2013年1月8日于北京北七家海鹈楼

一、周作人的“人学”思想

周作人与鲁迅的文章为世人所重，在很大的程度上靠的是其中所蕴含的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就高度肯定了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存在：“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十年以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①后来由于他的不光彩的行为，人们就讳谈他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了。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又被显著地提了出来。舒芜长文《周作人概观》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期上发表时，就点到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存在，此文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为题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时，舒芜作了补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个，尽管两人的思想不相同，个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②周作人的思想影响既然如此之大，那就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和继承。

周作人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人学”思想。“人学”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也是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20世纪40年代，他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时说：“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③他对文化人类学颇有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为知道“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或云“化中人位”）。^④这说明他对“人学”思想的建

① 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1934年12月《青年界》第6卷第5期。

②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4页。

③ 《书房一角·原序》。

④ 《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构有着明确的自觉。他的“人学”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可以叫作社会伦理层面，是人本主义的，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另一个可以叫作形而上层面，表现出了悲观主义的内容。在现实的撞击下，他的悲观主义时常从思想深处上泛，使他的“人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色彩。悲观主义的“人学”思想制约了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他选择以审美的态度来观照人生，既不忘情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周作人不断调整和重新组合他的“人学”思想。他努力沟通它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重新阐释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然而他在传统的形式中表述的仍是西方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质。

在一些人的眼里，汉奸与思想家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不妨先把周作人是不是一个思想家的问题搁置起来，看一看他表述了怎样的思想。

1. 人本主义

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论文《人的文学》^①，揭橥了“人的文学”大旗，在对文学主张的系统阐释中表述了他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什么是“人的文学”呢？“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因此，“人的文学”又被他称作“人道主义的文学”。人道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范畴，不同的时代、国家和个人往往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周作人明确指出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②简言之，就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本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们还没有真正能从哲学的高度为他们所信奉的原则提供依据，他们的思想基础只是还不成熟地强调人自然本性的人性论。17、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提出的自然主义人性论是这种人性论的系统化。到19世纪，费尔巴哈为人道主义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构造了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以人道主义为归宿的伦理学体系。周作人正是从受进化论影响的自然主义人性论的角度理解人的，在《人

① 收入《艺术与生活》。

② 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载1920年4月《新潮》第2卷第3号）中说，杜威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中，把个人主义分为两种：一是“假的个人主义”，就是唯我主义（Egoism），性质是自私自利；另一是“真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特性有独立的思想和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两种。中国大陆学术界在很长时期里一直用“个性主义”一词代表那种“真的个人主义”。

的文学》中提出“从动物进化的人类”的命题。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换言之，人的灵肉一致，人性是动物性和神性的有机结合。他强调人的动物性，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善的，应该得到完全的满足；同时，又应该看到人有他的内面生活，有健全的理性，有改造生活的力量，能够促进人类日臻完善。这样一来，阻碍人性向前发展的“兽性的余留”和“古代礼法”都应该受到排斥，得到纠正。他在《妇女运动与常识》^①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Gnothi seauton），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我所主张的常识，便即是使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工具”。后来，周作人对“常识”作过解释：“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②为此，他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拟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知识科目表，希望人们由此得到“融会全体的普通智识”（即“常识”）。这些“常识”总共分为五组，“第一组的知识以个人本身为主，分身心两部”，“第二组是关于生物及人类全体的知识”，“第三组是关于天然现象的知识”，“第四组是科学的基本知识”，以上四组都是科学知识，“他们的用处是在于使我们了解本身及与本身有关的一切自然界的现象，人类过来的思想行为的行迹，随后凭了独立的判断去造成自己的意见”。“第五组特别成为一部，是艺术的一类”。其好处是，“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不必人人是文学家而各能表现自己与理解他人；在文字上是能通畅运用国语，在精神上能处处以真情和别人交涉”。这些“常识”是人认识自身或者说理解“从动物进化的人类”的命题所必需的，也即是“人学”的基础。

他对人性的认识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基本上一致。费尔巴哈“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 and 精神的二元论”，肯定人的本质是感性，是他的自然本性；但他又认为，这还只是说到人的“一半”，“人不仅仅跟自然界一切其他的事物和实体一样地都有本质和存在，他又有一个独别的本质，他有理性、

① 收入《谈虎集》。

② 周作人：《〈一蓑轩笔记〉序》，收入陈子善、张铨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

精神”。^①可以说，人本主义代表了周作人社会伦理层面的“人学”思想的基本内涵。与19世纪思想家不同的是，周作人接受了19世纪末以后众多的新知识的影响，对人的理解更深入、全面。周作人在《谈虎集》的《后记》中说：“大约像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十八世纪人才略有相像，只是没有那样乐观，因为究竟生在达尔文弗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为凡人了。”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现代的民族国家，系统地文化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他们接受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近代文化，与以封建主义集体意识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激烈冲突。在这场文化选择中，他们大都把价值取向指向西方，接受了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固有文化。

周作人读书甚广，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鲜有人能比，其“人学”思想所受的影响广泛而复杂。如果把它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这条河流有着众多的大大小的支流。1944年夏秋间，周作人写了一篇总结性的长文《自己的文章》^②，大致勾勒了一幅自家知识和学问构成的“水系图”。他说他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只喜欢涉猎闲书，又是非正统的“不中的举业”，所以借用《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卫举人的话，自称“杂学”。此文后来收入《知堂回想录》时，作者加了如下小标题：一，引言；二，古文；三，小说与读书；四，古典文学；五，外国小说；六，希腊神话；七，神话学与安特路朗；八，文化人类学；九，生物学；十，儿童文学；十一，性的心理；十二，葛理斯的思想；十三，医学史与妖术史；十四，乡土研究与民艺；十五，江户风物与浮世绘；十六，川柳落语与滑稽本；十七，俗曲与玩具；十八，外国语；十九，佛经。还有些重要的方面没有道及或语焉不详，如新村主义、《圣经》与俄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上述诸多方面如果一一考察，需要一本厚厚的专著的篇幅。下面仅就周作人思想中几个重要而又富于特色的方面略加评述。

受生物学和进化论的影响。周作人读了很多生物学上的书，经常提及怀德（Gilbert White）、汤木孙（Thomson）、法勃尔（Fabre）等人的生物学著作。他对动物的本能感到惊奇，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他于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从动物进化来的本能的尊重，反对一切来自外界强行压抑人动物性本能的种种法则。他要求制定人类行为的标准以生物学为依照，合乎人性物理。一句话，人生哲

①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荣震华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月新1版，828页。

② 收入《苦口甘口》。

学需要接受生物学的检验。“我不信世上有一部法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①早在南京求学时期，他就开始接触进化论，进化论给他的人性论、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都打上了深刻的印记。他说：

个人的自觉的根本，在于进化论的人生观。……现在的人生的多面相，当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应该除去的地方，但是人生的原则，在凡生而为人者都有坦白的肯定的必要：这便是自己的与种族的保存。（保存里含有存在与发达两事。）进化论的人生观便是这一种态度，积极的肯定人生，勇敢的去追求“全而善美”的生活，正是辛奇所论的“要做好的人须得先做好的动物”，也即是尼采的所谓“忠于地”。^②

进化论的人生观构成了周作人社会伦理层面上的“人学”思想的基础，他以此为准绳，汲取众多的思想成果，以构筑自己的世界观体系。

受性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周作人接受了英国性学大师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性道德观念。蔼理斯和弗洛伊德一样是性学领域著名的先驱人物，周作人的性道德思想多本诸他的多卷本巨著《性心理学》^③。他说过：“半生所读书中性学给我的影响最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耳特之流，皆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扩，懂得人情物理。”^④他在回忆从东京的书店所购买的英文书时，又说：“最重要的是蔼理斯的《性心理之研究》（即《性心理学》——引者）七册，这是我的启蒙之书，使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⑤从蔼理斯那里，周作人接受了最根本的性道德观念：人正常的性欲望应该得到自然健康的满足。关于蔼理斯我在后面还将谈到。英国学者安特路朗（Andrew Lang）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引起了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他在《我的杂学》中说：“于我最有影响的还是那《金枝》的有名的著者弗来

①《谈虎集·祖先崇拜》。

②《女子与文学》，1922年6月3日《晨报副镌》。

③《性心理学》第1卷出版于1898年，到1910年出第6卷，1928年续到第7卷。1933年，蔼理斯又出版简写本的《性心理学》。20世纪40年代有潘光旦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7月重印。

④《瓜豆集·鬼怒川事件》。

⑤《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则博士。社会人类学（英国称“文化人类学”为“社会人类学”，而在西欧的德国和奥地利一般称之为“民族学”——引者）是专研究礼教习俗这一类的学问，据他说研究有两方面，其一是野蛮人的风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国的习俗，盖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此外，原籍芬兰而寄居英国的威思忒玛克（Westermarck）的《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对他影响也很深。周氏对儿童学的兴趣也是由文化人类学延伸出来的，文化人类学为其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提供了基础的学理支撑。性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五四”时期发挥了深刻而独到的作用。

受文学上以强调爱为特征的人道主义的浸染，他表佩服于俄国文学。俄国生活困苦，所以文学里含着一种阴暗悲哀的调子，但这个结果并不使他们养成憎恶怨怼或降服的情绪，反而培养了对于人类的爱与同情，俄国作家对“被侮辱与损害的人”抱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他特别景仰俄国生活和文学上的一种崇高的悲剧气象，尤其推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爱的福音”的文学。^①据日记载，他于1918年1月收到过日本中西屋的寄书《トルストイ人道主义》（《托尔斯泰人道主义》），这表明他对托尔斯泰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很留心的。他认为世界“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②，《圣经》中高大宽博的人道主义精神、神拥抱一切的慈悲使他敬服。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是博爱型的，这与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源流直接相关。周作人和两位俄国作家一样，都是在深深地意识到人生的苦难以后才信仰人道主义的。周作人在南京求学时期就受佛经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想超越人生，对芸芸众生有一种悲悯的感情，后来他虽然反对“悲天悯人式的慈善主义”，但它在无意识中对周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构成是起作用的，并且与他的悲观主义也衔接着。

日本新村主义提倡的“人的生活”启示了“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所谓“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日向建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基地。其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是20世纪初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它在人道主义爱的旗帜下，提出“人的生活”的社会理想。在倡导者武者小路实笃看来，人应该成为“地平线以上者”，应该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他在物质上除去衣食住的忧虑，精神上能得到自由发展，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也应该尽

①《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②《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